

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

康虹麗撰

私立中國文化學院

史學

研究所研究生碩士論文

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

指導教授：杜維運教授

研究生：康虹麗 撰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提要

清末民初的學者，面臨著一個大轉變的時代，亦欣逢中西兩大文化交流之際，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接觸和認識，固非幾千年來中國的學者所能及，而其心中所懷抱對中國文化的體察和了解，又非任何一個外國學者可與倫比，所以，清末民初雖是國運逆轉，在歷史上不是一個輝煌的時代，但是，就文化交流和學術思想而言，却有其優越性和特殊性。

本文即是敘述當時兩位名史學家梁任公先生和柳翼謀先生對中國史學和西方史學的看法，以他們的觀點爲代表，來探究民初史學思想的趨勢，並希冀由此能對民初的史學做探原性的研討，當然，由於梁、柳二氏對中西史學的取捨不同，二人的觀點就有許多相左之處，本文亦一一敘述以求互相發明，並由兩者的比較之中，獲得對一個問題的面面觀。

第一章緒論：除簡介梁氏和柳氏的生平外，並對二人提倡新史學和國史論的背景做一個概括的說明。

第二章梁任公的新史學：討論梁氏新史學的理論：如他對中國史例、史法的看法和中國史學注重個人和政治等的問題。

第三章柳翼謀的國史論，亦同樣的討論柳氏對中國史例，史法的看法和史學的政治性等問題。

第四章論新史學和國史論，將梁柳二氏對相同的問題所做的不同的看法做綜合性的討論，並藉民初史家和西方史家的觀點做本文的理論依據。

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

史研二康虹麗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	----	---

第二章	論梁任公的新史學	六
-----	----------	---

第一節	史書應以羣衆爲重心	
-----	-----------	--

第二節	中國史學家應摒除先念力求客觀	
-----	----------------	--

第三節	史書爲供「現代」人的資鑑者	
-----	---------------	--

第四節	以新史法爲中國史學開一新境界	
-----	----------------	--

第三章	柳翼謀的國史論	二七
-----	---------	----

第一節	史書和史家的政治性爲中國史學的根本	
-----	-------------------	--

第二節	具有以禮爲核心的史例是中國史學的特徵	
-----	--------------------	--

第三節	一貫而完備的史法是中國史家的精心	
-----	------------------	--

第四節	史書的專重資鑑爲中國史學的定法	
-----	-----------------	--

第四章	新史學和國史論的比較	五三
-----	------------	----

第一節	史學的政治性及其和時代潮流的關係	
-----	------------------	--

附
錄
重
要
參
考
書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七

第
二
節
論
史
學
的
主
觀
性
，
客
觀
性
和
實
用
性

第
三
節
論
國
史
體
例

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

第一章 緒論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整個中國由於西洋文化入侵的刺激，開始了新的一頁，中西兩大傳統一接觸，中國即處於劣勢，幾經軍事，政治等對西方的模仿，學習，都未能替國運帶來轉機，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亂。終於，代表著人類思想較深層面的學術界，也經不起時代的劇變，至民國初年，開始對舊有的傳統思想發生反動，而熱衷於追隨西方的學術思想潮流。就在這個轉變的新時代，中國的史學界也免不了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於是許多留學生和在思想上求新的學者，起而提倡新史學。他們除了撰文介紹西方史學，並據西方的史學觀點來批評中國的史學之外，還引用清代史學家章學誠的主張，為新史學的理論助陣。當時提倡新史學最力，又最有影響力，可為新史學理論的先導者，當推梁啟超先生。

梁啟超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廣東新會人，生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卒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享年五十七歲。他

是一位在中國現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人，其聲名起於他早年和康有爲等參與的維新變法。此後，他的一生亦大部份從事於政治活動。一註——不過，我們與其說他是一位政治家，倒還不如說他是一位政論家。因爲他的勢力不是來自軍隊，也不是起於他的政治手腕，而是由於他的才氣橫溢，學問博大，見解過人的緣故，他又有很健的文筆，自言筆鋒常帶感情，因此他能隨時將他的感受用最感動人心的言論發表出來。當時的人心又正處於極不穩定的情況，從而就造成了梁氏在思想上的勢力，常能左右輿論。

梁氏的全心致力於學術研究，是在晚年，尤其是民國九年，歐遊回國之後，講學的時間更多，範圍大都是史學方面的，他除了在清華大學任教之外，亦常至南、北各大學講學，對當時的青年學子在史學方面的認識極有啟發，亦深具影響，他在史學方面的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文補編，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研究六篇，王荊公，先秦政治思想，新史學，等皆見解過人，寫法新穎，誠爲史學中之巨著。一註二

但是他對史學界的影響和貢獻，却不能以這些來估價的，我們可從前面所述他在政治方面的「性格」中看出一個對比來。他對史學界的貢獻也是屬於啟發性的，尤其是在思想觀念上的創新和推廣更有莫大的功勞。他曾自比爲思想的陳涉：

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爲無制限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獎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註三）

誠然，他這種多變的性格，用在政治上，可能不大合適，但是在學術方面確有其創造性。所以，當民初中國的各方面都在求變的時候，梁氏也基於他對中國舊史的不滿和西方史學思想，方法的刺激，提倡「新史學」，主張用新的史學方法和觀念來撰新史，並避免爲傳

統思想所蔽，由於他的聲望和文筆的吸引力，新史學即刻就贏得了羣眾的反應和共鳴，而成爲民初史學界的一大趨勢。這亦是梁氏對史學界最大的貢獻。所以，他雖然並未寫出一部新史，他所提出的論點並不很成熟，對西洋史學的了解亦不夠深刻，但是他對民初史學思想，和方法的轉變都有不可磨滅的功蹟。

在求新的過程之中，中國史學方面的轉變，其因素成份和社會學，經濟學方面的全盤接受西方的觀點和方法不同。原來，中國的史書自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悠久而無間斷（一註四），和西方的史學完全走著不同的路子，兩者之間的伏劣很難比較。不過中國史學觀念和方法不能說沒有缺點，目劉知幾到章學誠（一註五）都曾著書批評，但是每朝的史家只知依先賢的體例，觀念相因循，而不求運用，創新。因此，幾千年來史書的缺點亦無法避免。至清代，史學又侷促於考證一隅，雖有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其精闢論點，不在任何西方史家之下，但以時代環境所限，影響力不大。至民初由於東方文明居於劣勢，西方的史學理論漸爲中國史學界所重視，並且

發現其理論和章學誠有不謀而合之處，「新史學」亦應時而生，故新史學與清代史學家的關係及所受清代史學背景的影響，亦是不可忽視的。

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極為悠久的國家，其根植於人心，潛移默化，要想將其轉換，代以新的思想，文化，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當西學東漸之時，思想前進者，爲求使中國能較快的適應這個新的時代，環境，常不惜以攻擊固有的傳統文化爲手段。當然，新史學的傳播也不例外，這種方法誠然給當時的人心一種強烈的刺激，起而求新，但是數十年後新的一代，却由於對中國傳統的輕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爲中國帶來了災害，這是新史學在傳播方法上的疏漏。

同時，史學觀念的轉變和實際政治，社會情況的改變有很密切的關連，古史的缺失並非最大的原因。因此，在梁氏提出新史學的理論之後，有許多人，並非反對史學的求新，但很不贊成新派學者攻擊中國古文化的態度，他們以維護傳統自居，要爲傳統的古文化說幾句話，其中見解最深刻，能爲中國史學析出精義者即柳詒徵先生的國史要

義一書。

柳詒徵字翼謀，號劬堂，江蘇鎮江人，清已酉年優貢。生於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由於大陸淪陷，存之未卜，倘若尚在人間，差不多屆九十高齡了。他出身微寒，又幼年喪父，早年受母教，由於慈母的督促，從小就能將我國古代的重要經典讀的爛熟，他自己曾說：「我對若干文史要籍是爛熟於胸中的。」由此可見一代大師的學力深厚是由小培養的。（註六）

及長，曾在學堂中教書，並師受繆荃孫先生、王先謙先生和黃以周先生於南京鍾山書院和江陰南菁書院，「這三位先生都是碩學名儒，精博絕倫，而又志同道合，對柳師的青年時代，影響至大。」（註七）後柳氏任教於南京高等師範及後來的國立東南大學，並主持江蘇國學圖書館達三十年之久，在校中，他開中國文化史及亞州史的課程，並授歷史研究法，以其淵博的學問，循循教訓，很能影響學生，他並常在學衡、史地學報及史學雜誌等雜誌中發表文章，數十年來忠於教職，館職，不愧為學者楷模。

中國文化史一書爲柳氏的代表者，由此書的宗旨「表揚民治精神，前者指中華民族羣策，羣力急公好義的精神，後者指中華志士提高人格注重節操的精神」一註八一我們可以看出他治學的抱負，因爲他曾說：「雖然，孔子之學非徒爲自了漢，不計身外之事，成己之物，照已必立人，在修身之後却推至於家國天下，其於建國，爲政，理財，治賦之法，無一不講求而致用於世。」一註九一這何嘗不也是柳氏爲學經世的理想？在治學的態度上，除了受到繆荃孫的影響，繼承乾嘉考證學派，治學嚴謹之外，更能「融會史學和哲學」，「融貫經史而能泯除漢宋之爭」。所謂「柳師對史學，主張沿流討源，援古證今，講明當代典章文物，以達經世致用之目的。」一註十一這就是柳氏一生爲學的方法和抱負了。

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柳氏却儼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爲己任」一註十一他並非反對求新，但是以爲「求古人之惡而暴之」是有損「史德」的作風一註十二，甚不可取。同時，他對中國史學的傳統，非常推崇，他用沿流討源的方法，

來闡明中國史學的精義，以爲中國史學的發展並不亞於西方，甚至章學誠指出的許多中國史學的缺點，他都以如是多餘，因此，梁任公新史學理論中的某些論點，尤其是關於批評中國史學的，他都不贊同，爲了發揚中國史學的精義，以對抗新文化的提倡者，柳氏撰文鼓吹，不遺餘力，誠爲當時「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學者們的中堅。

中西，新舊之爭，近百年來都未曾息止，梁任公所提倡的新史，及其對中國史學的態度，和柳翼謀對中國史學的維護皆是近今史學思想的代表，兩者不同的看法雖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但是將兩者放在一塊來看，來比較，也不妨是研究民初史學的思想及趨勢的一個方法，中西兩大文化發展不同，淵源不同，但皆爲人類思想的一部分，幸能會合，而民初的學者又首當其衝。所以要研究民初史學史，溯民初史學之思想淵源，不能忽略新史學觀念所給予的影響，亦不能略去中國固有史學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我們亦可由新史學和國史論的理論比較分析中，得其精義和淵源了。

附註：

(註一)：參見丁文江著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 世界書局民國五

十一年版

(註二)：同前

(註三)：見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頁六五 中華書局民國五二

年台三版

(註四)：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引論頁一 國立編譯館民國五五年

台十版

(註五)：見何炳松著通史新義自序頁六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五四台一版

(註六)：見張其昀著吾師柳翼謀先生 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二

期頁三九 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五七年出版

(註七)：同前

(註八)：同前頁四一

(註九)：見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頁三〇五 正中書局民國五六

年台七版

(註十)：見吾師柳翼謀先生頁四〇

(註十一)：同前

(註十二)：見柳詒徵著國史要義頁一〇三

一年台二版

台灣中華書局民國五

第二章 梁任公的新史學

梁氏是新史學啟蒙時期的人，根據他本人的意見，就以爲任何一個新思潮的興起，都必定是先破壞，然後才有建設的。所以，梁氏新史學的理論就建立在他對舊史的反動上面，先指出舊有史學理論的謬誤，然後再發新論，但是如果說梁氏絕對的否定了中國固有的史學的話，却又不甚公平，因爲，梁氏在批評中，並沒有忽略時代因素，他亦體會到新史的需要，並非全由於古史之失，客觀環境及時代的改變，才使撰述新史成爲當務之急的。